

·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·



刘绍棠小说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刘绍棠小说选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徐 靖
封面设计 戴 卫
插 图 王为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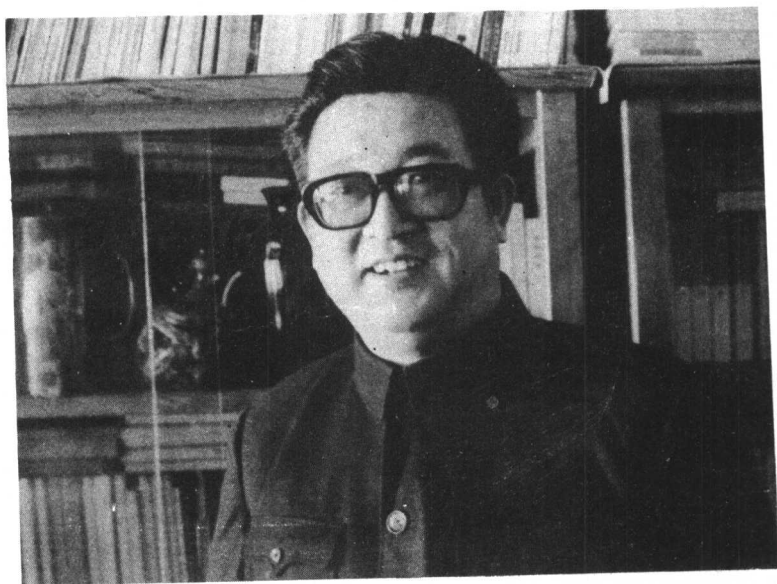
刘绍棠小说选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.625插页 6 字数324千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4,400册

书号: 10374·87

定价: 3.15 元



作者近照

花街

花街是运河滩上的一个铺伙，不是一个村落。

多年，有个姓花的财主，每年一百两银子，从通州衙门已沿河一眼望不到他的柳棵子地，还有沿河几里丛生着芦苇、野麻、三棱草和狗尾巴花的浅滩，他在柳棵子地里的三通河水上，搭起几间高棚，四面八方招揽十几个开荒种地的长工，立起几间伙舍，左右都不留村落，就叫花街。

后来姓花的老地主撒手归西，几个儿子吃、喝、嫖、赌，不上二年就败了家，把这大沿河滩弄的碎打，一寨子一块地了去，最

作者手迹

出版说明

本集收入的十个中、短篇小说，是作者从他大量作品中选出的。有五十年代的代表作《摆渡口》和他近几年来蜚声文坛的作品，如《蒲柳人家》、《蛾眉》、《荇水荷风》、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、《绿杨堤》等。可以说是这位多产作家作品的精华。

作者被誉为乡土文学作家。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写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，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，在描写手法上，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，传奇色彩较浓，语言纯朴生动。

自序

我是党从小栽培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和作家，党给了我思想，给了我知识，给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；养育之恩，山高海深。

五十年代，我曾一帆风顺地成长和前进，写出不少作品；然而，我的每一寸成长，每一步前进，都是牵着伟大母亲的衣襟得来的。党在我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我难以计算；但是，我对党的报效极少，自己是很知道的。

革命的道路并不笔直，我遭遇了二十二年漫长岁月的坎坷。

我在大运河岸边的一个小村的土炕上呱呱坠地，吃大运河的乳汁长大，在短篇小说《红花》、《青枝绿叶》、《摆渡口》、《大青骡子》、《运河滩上》、《山楂村的歌声》及中篇小说《运河的桨声》和《夏天》中，我满怀热爱家乡的激情，讴歌家乡的美好生活和美好的人。

因此，当我被赶出文坛、回归故土的时候，大运河慈母将

我拥抱在温暖而深广的怀里，给我的生命以新的充实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，我从北运河畔的儒林村，重返阔别二十二年的文坛，只觉得眼花缭乱，手脚不知放到何处。三十年前，我走上文坛的时候，是个头顶高粱花、脚踩黄泥巴的农村野孩子；现在，我又象一个乡下佬从青纱帐里走出来，一步闯进了花花世界。二十二年没有发表作品，我感到一切都陌生，是个十足的外行了。

在北京文艺界春节联欢会上，我第一次抛头露面，不少人递条子给大会主持人，点名要我讲话。在掌声中，我心慌意乱地上了台，我本来没有思想准备，上台之后百感交集。定了定神，说了几句拜年的吉利话，便直通通地当众宣告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：一生一世讴歌生我养我的劳动人民，保持五十年代的田园牧歌风格。

看过一九八〇年我在南京《青春》文学月刊上连载的《被放逐到乐园里》的人，就会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。最近，研究我作品的同志，把我在一九五三年入党宣誓那天的讲话原文，一九五八年三月我被开除出党的当天给老同学的信，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期间，我给在劳改农场的从维熙的七封信，以及我在一九七九年一月改正了错划问题后，新华社二月四日发表消息第二天所写的《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》，搜集到一起进行对照，他们感到对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在入党那天就宣誓永远遵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创作；在开除出党当天所写的信上表示，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，但是思想感情永远不离党；在十年内乱中给从维熙的信上，我激励他挤时间写作出作

品，将来敬献给党和人民；在《让我从二十一岁开始》一文中，我表示要加倍地劳作，以弥补自己二十二年未能为党和人民正常写作的空白。

在漫长的坎坷岁月中，我对党没有离心。我在荒屋寒舍中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《地火》、《春草》、《狼烟》，都是讴歌我家乡人民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恢复了党籍，我在座谈会上发言说：“我的心情很沉重。我们的党遇到了困难，我这个入党多年的人，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，为党分担一点困难，而不能给党添麻烦。”因此，我重返文坛，虽然眼花缭乱而四顾茫然，心中却抱定了宗旨：我的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。

我二十一岁受到全国性批判，当了二十二年不可接触的贱民，难道没有伤痕吗？当然有的。但是，党是我的亲娘，是党把我生养哺育成人。虽然母亲错怪了我，打肿了我的屁股，把我赶出了家门，我是感到委屈的；但是，母亲又把我找回来，搂在怀里，承认打错了我，做儿子的只能感恩不尽，今后更加孝敬母亲。难道可以怀恨在心，逼着母亲给自己下跪，啐母亲的脸吗？那是忤逆不孝，天理不容！

在我遭遇坎坷，回归家乡的年年月月，我们儒林村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同情我，心疼我，优待我，爱护我，救助我，使我这么多年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没有受过任何污辱，而且能够写出作品；我重返文坛，难道不应该感恩戴德，讴歌他们那多情重义的美德和恩情吗？人得有良心。

即便是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日子里，好人也是占绝大多数，黑暗中也闪耀着光明；我写好人和光明是从生活出发，有生活的原型和真实的生活为依据的。

面对五光十色的创作现象，一九七九年底我对自己重返文坛以后的作品进行反省。我认识到，时隔二十二年之后，时代变了，我坚持五十年代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，但是艺术上的改进、革新与提高，却是必不可少的，不能停滞在习惯性上。那么我将如何改进、革新和提高我的创作呢？和我的同辈作家、新起作家比较，发现他们各有我所不具备的长处，比不了，也赶不上。然而，在我充分认识自己的短处的同时，也看见了自己的长处。相对而言，我的长处是熟悉农民。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前后有三十年以上生活在我出生的儒林村；我熟悉农民的思想、感情、心理和愿望，熟悉农村的风土人情特色，在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观点上，也和农民一致。另一个长处，是我比较擅长描写美好的人、生活中的光明面和优美的风光景色。在艺术手法上，我也看清了自己的劣势，找到了自己的优势。土生土长，多年与农民一起土里刨食，朝夕相处，我在口语上已经农民化，没有知识分子腔儿，因而写小说能够使用具体、生动、形象、含蓄、富有比兴的诗情画意的农民口语。我自幼接受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熏陶，我的艺术教养得自农民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、故事、评书、歌谣小曲、野台子戏、杨柳青年画……因而我和农民有共同的艺术欣赏习惯，能够运用民族形式。我爱好中国古典文学，从小就对中国的古典诗词、散文和小说深感兴趣，上大学后又听了知名学者讲授的

古典文学课，更增长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，加深了认识，在创作上也就注意向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，首先为农民而写，一辈子写农民。

然而，我缺乏实际工作经验，性格气质上热情外溢而不深沉内向，不善于发现问题和抓住矛盾，只能写风土人情，因此，我又决定致力于乡土文学。乡土文学是农村题材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区域，是文学创作百花园中的一朵野花。

我的乡土文学创作，是从中篇小说《蒲柳人家》开始的，中篇小说《渔火》和短篇小说《蛾眉》是进一步的试探性的扩展。

《蒲柳人家》能够写得很顺手，是因为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、环境、情节，我都非常熟悉；人物有原型，环境有出处，情节有来路。我曾在几篇文章中写过，何满子的主要原型是我，望日莲的原型是两个童养媳和一个被姨母卖入娼门的孤女，何大学问的原型是我的曾祖父和祖父，一文青大娘的原型是我的曾祖母和一位姓杨的老太太。几个研究我作品的大学毕业生，两次到我们儒林村进行了十几天的实地调查，他们和杨老太太的孙子谈了话，并且对运河滩的风光景色拍了照，对小说中的若干情节找到了原始素材的验证，他们还走访了我的村中父老、开蒙老师和同时代人，详细了解我的童年轶事。他们写出几篇专访文章和毕业论文在几个报刊上发表。

写作《蒲柳人家》的整个过程，我力求保持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，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，再现北运河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农村的风土人情。我的家乡

本是燕国故地，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，我的家乡农民非常豪爽仗义。久远的历史不必追述，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余波，在我的家乡直到康熙年间才平息下去。清朝末叶，义和团运动又在我的家乡兴起，八国联军侵略者洗劫了我们儒林村；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村里还留有许多断壁残垣。辛亥革命的志士，为推翻满清王朝抛头颅、洒热血；一九八一年十月，我发起为蔡德辰等七烈士举行纪念会。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暴动，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，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，我的家乡大地上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。我的家乡又地处京津之间的北运河航道上，农民又兼做船夫、渔夫、脚伕、苦力，上京下卫，得风气之先，不象边远农村那样闭塞；因此我的家乡农民又具有开通、狡黠、机智、风趣的特点。北运河农民有习武的传统，又由于地处天子脚下，文化水平也较外地略高；一八六七年，美国教会开办洋学堂，在农民中也产生了影响。北运河流域的农村具有与外地农村不同的特色，流域之内和村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。我们儒林村以及沿河的一些村庄，本是清朝王公贵族跑马占圈的领地，讲北京土话，穿衣打扮、生活习惯、风俗礼节都是“京派”。但是，我们儒林村以东五里的村庄，口音便与唐山一带的口音相似；西南村庄的村民口音，却又与天津土话相似。外乡人住上几年，也看不出村与村之间的差异，只有我这个本地人一眼便明辨秋毫。

中篇小说《渔火》，写的是三十年代北运河船夫的生活特色；从田野写到河流；从村庄写到县城，加强了地方风味。

我一直为短篇小说不短而苦恼。我把短篇小说比作小说创

作上的平衡木运动，它必须接受形式和格局的制约，从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掉下来，便要扣分，不算佳作。为此，一九八〇年我一直把《聊斋志异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带在身边，每天阅读琢磨，希望得到潜移默化。十月，到湖南参加“芙蓉”笔会，遍游湖南各地，沿途几次动笔，开头都不顺利。下旬，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，夜宿宾馆，想起一九五五年十月，我曾担任共青团中央赴湖南工作组组长，参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在韶山住过的一夜。转眼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，心情激动，感慨很多。深夜两点，我在强烈的激动和感慨状态中写起来，一口气写到凌晨五时，写出了《蛾眉》的初稿。打了个盹儿，吃过早饭上路，又奔赴花明楼。

《蛾眉》中人物和故事，也都有根有据。十年内乱后期，我的家乡的年轻小伙子，不少人从外地买来媳妇，我的一位老同学的儿子，也是其中之一。小说中的唐二古怪，就是以我这位老同学的本家叔父为生活原型。有人对我写农家子弟考上大学表示怀疑，认为是我理想化。他们不了解我家乡的实情。解放以前，我的家乡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，解放以后，我第一个考上大学，从此便打开了通向高等学府的道路。十年内乱以前的十七年，我们小小的儒林村先后五人上大学，一人上大专，四男二女，贫下中农子女三人。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，我的家乡年年都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，总数超过十年内乱以前的十七年。我国农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，虽然也遭遇许多坎坷挫折，但是在思想觉悟和精神面貌上，早已不同于阿Q或闰土了，不能把农民写得狭隘、自私、迷信、落

后，混淆两个时代，混淆新旧社会。

我要求一九八一年的创作做到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，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，识字的人看得懂，不识字的人听得懂。力求以人物的个性语言刻画人物性格，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动；通过动态中准确的细节描写，来塑造人物的形象。这种追求，既是我研究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的心得，也是我在家乡得到民意测验的结果。使农民喜闻乐见，雅俗共赏，是我在小说创作上的奋斗目标。

同时，根据我个人的条件，我又要求我的中篇小说还要做到“少（人物少）、小（事件小）、短（篇幅短）”；在内容上，要丰满，不要“丰富”；在风韵上，要自然和从容。

人物少，免得笔力分散，力不从心。事件小，是大处着眼小处落墨，以小见大。篇幅短，对文字自我限制，以求精炼、简洁、准确，少写空、套、废话。中篇小说的体制，不能包罗万象，不能是长篇小说的缩写，或短篇小说的发酵；中篇小说好比自由体操，虽比平衡木运动的空间大，却也有一定的范畴，不能漫无边际。丰满，就是要把人物和故事都写得充分、充足、充实。一把米舂上一定分量的水，蒸出一碗饭，不要兑上几桶水，熬成一锅粥。

一九八一年，我创作和发表了十部中篇小说，没有一部超过三万五千字。《瓜棚柳巷》、《花街》、《草莽》、《荷水荷风》是《蒲柳人家》之后的再接再厉。

看不见本村的树梢，便分不出东南西北；一瞧见自家的烟囱，就来了能耐。这是我的家乡父老形容恋家子弟的俏皮

话。

我便是这一类的恋家子弟。只要稍长时间没有回到家乡住一住，我便心里发毛。虽然，我前前后后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生活了三十多年，对每一家，每个人，都十分熟悉；但是，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，我不身临其境，亲历目睹，便有如朦朦胧胧云遮月，恍恍惚惚雾里花，对自己的小村也看不真切了。我的乡土文学创作离开了乡土，只能孵豆芽。

因此，年年桃红柳绿的暮春时节，我便象八九雁来，回到家乡睡土炕，吃榆钱饭，跟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团聚。所以，三中全会以来家乡一年比一年富的情景，我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年鉴。当我感到有了几分把握以后，我便开始运用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法，创作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。

从一九八一年六月到现在，已经创作和发表了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、《绿杨堤》、《烟村四五家》、《凉月如眉挂柳湾》第十五部。我力求开采要广，开掘要深，做到城乡结合，今昔交叉，自然成趣，雅俗共赏，开创我的乡土文学创作的新局面。

写这些小说，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“深井”。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，只要我不脱离儒林村，我便不会缺乏创作的题材和素材。这些小说的一部分，是我在儒林村写出来的，身临其境进行创作，分外得心应手。那几位研究我的作品的大学生，亲眼看到我的两部中篇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。动笔之前，我带他们到各家各户串门，告诉他们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是谁，情节是从哪个人或哪一家得来的，小说中所描写的具体环

境，在村庄的哪个部位。他们深深认识到，作家必须深入生活，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。是的，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；作家更必须与工农结合在一起，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，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根本原理之一。

对于我，好象形成了一个规律，只有看到家乡的树梢和烟囱，我的创作情绪才昂扬起来；每年只有脚踏实地在家乡的热土上，和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朝夕相处，我的创作才能进入旺季。

四十二年前，毛泽东同志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，到工农兵群众中去，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。我的三十五年的创作生活经历告诉我，我虽然不是个有出息的人，但是如果不深入生活，就会更没出息。

是的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，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。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，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。忘记、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，艺术生命就会枯竭。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、主题、情节、语言、诗情和画意，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，~~这就是~~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。

这条路我已经走了三十五年。今后的岁~~月~~也~~将~~不后退，不拐弯，大步流星地一直向前走去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重记于北京光明胡同45号

目 录

自序	1
摆渡口	1
芳草满天涯	10
蛾眉	46
蒲柳人家	63
花街	149
荇水荷风	204
小荷才露尖尖角	255
绿杨堤	303
烟村四五家	361
凉月如眉挂柳湾	413
作家小传	485